

“传字辈”的传奇

沈鸿鑫

有不少观众是从昆剧《十五贯》开始认识昆曲和“传字辈”的。周传瑛、王传淞、包传铎、周传铮等艺名中都有一个“传”字，所以人们把他们这个艺术家群体称为“传字辈”。

苏州昆剧传习所的建立和“传字辈”艺术家的涌现，在中国昆剧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传字辈”是昆剧史上的一个传奇。



1928年，青年时期的昆曲“传字辈”演员合影。

“传字辈”艺名的由来

“传字辈”艺名的由来要从苏州昆剧传习所谈起。昆曲元末明初，起源于苏州昆山，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从明天启元年清康熙末年100年间为极盛时期。清代中叶（乾隆年间）以后，昆曲逐渐由盛而衰，到清代后期，昆曲班社大量减少，在苏州、上海仅存大雅、全福等几个班社，盛行一时的昆曲面临着消亡、失传的危机。

为了抢救昆曲，能让昆曲这一古老的艺术得以传承下去，1921年8月，苏州的有识之士和昆曲爱好者吴晋眉、张紫东、徐镜清等发起在苏州创办了苏州昆剧传习所。参与者还有徐凌云、吴梅、孙咏琴等约20人，上海实业家穆藕初等也予以资助。所长为孙咏琴。传习所的教师都是昆曲名班全福班后期的艺人，如沈月泉、沈斌泉、吴义生、尤彩云等。第一次招生20余人，学员都是十三四岁的贫苦子弟，一部分是全福班老艺人的子弟或亲戚、邻居。据倪传铎先生回忆，当时学员一律住宿，膳食由传习所提供。业务课主要是拍曲子、走台步、练武功，还要求学员学文化、学音韵、学武术。

传习所成立后，学员经常在苏州、上海、杭州等地实习演出，开始时学员没有艺名，都用真名。如1922年2月，传习所首次到上海大富贵酒家堂会演唱，节目有朱祖容、周根荣的《寄东》《佳期》等。在这一年的稍晚，传习所开始给学员取艺名。学员姓氏不变，只改名字。为了体现传习所薪火相传的宗旨，学员艺名的第二字统一都有一个“传”字，而第三字则是按行当不同，分别采用不同的偏旁。

小生行用“玉”字偏旁，以示“玉树临风”，如顾传珩（原名顾时雨）、周传瑛（原名周根荣）、顾传琳（原名顾时霖）、赵传珩（原名赵洪钧）等；旦行用“草”字头，取“香草美人”之意，如沈传芷（原名沈葆生）、张传芳（原名张金寿）、朱传芳（原名朱祖容）、姚传芳（原名姚兴华）、方传芸（原名方三寿）等；老生、外、末、净行用“金”字偏旁，取意“黄钟大吕、铁板铜琶”，如郑传铎（原名郑荣寿）、倪传铎（原名倪筱

荣）、薛传钢（原名薛森宝）、邵传镛（原名邵锦元）、施传镇（原名施培根）等；副、丑行，用“水”字偏旁，以示“口若悬河”，如王传淞（原名王森如）、华传浩（原名华福林）、周传沧（原名周巧生）、顾传澜（原名顾根祥）等。除了中途退学的之外，当时取有“传”字艺名的学员有37位。这些艺名是由穆藕初请上海曲友、语文教师王慕荪先生所取。

“传字辈”的培养和兴盛

1926年，传字辈学员满师。满师前，应邀到上海新世界游乐场演出，每天日夜两场，很受欢迎。通过几年的学习和演出实践，传字辈的演员逐渐成长起来，在昆曲表演方面到达了相当的水平，其中顾传琳、顾传珩、朱传芳、周传瑛、张传芳、施传镇、王传淞等崭露头角，渐有名声，其他演员也颇受好评。

在新世界演出没几个月，北伐战争打响，上海不少戏院停业，1927年传字辈结束演出，回到苏州。学员们就算结业，结业时学生约48人。

1927年下半年，穆藕初的纱厂相继倒闭，传习所由上海大东烟草公司总经理严惠予和原上海海关监督陶希泉二位接办，仍由孙咏琴负责日常事务，并请俞振飞为顾问。他们随即组班成立“新乐府”，由沪上曲家张某某、俞振飞、吴晋眉、沈吉诚等人组织维尼公司，斥资2万元改建上海广西路的笑舞台，其全称为“笑舞台新乐府昆剧院”，“传字辈”艺人40余人

为该班主要演员，12月13日开幕演出。周信芳题赠：“古乐中兴”，徐志摩、陆小曼等名流出席观看。1928年4月起，新乐府又游演于上海青年会、新世界、大世界及苏州青年会等处。由于阵容强大，剧目丰富，反响很好。顾传珩、朱传芳、张传芳一生二旦走红成名，一时如音成集。

1931年6月，新乐府因故散班。传字辈的骨干演员又组班进上海大世界演出，戏班取名“仙霓社”。由郑传瑛、倪传铎主持社务，顾传澜值戏码。仙霓社还吸收了“小传字辈”的一批演员以及原全福班的老艺人等。最多时，社员有30余人。仙霓社除了演出传统折子戏外，还努力排演新戏，如《一捧雪》《描金凤》等，扩大了剧目，并在艺术上有所改革。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前夕，社会动荡，戏曲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仙霓社在上海大世界、小世界、大千世界等处相继演出，仍难以长期立足。1937年抗战爆发，战火燃至上海，仙霓社正在小东门福安游艺场演出，遭日寇飞机轰炸，戏箱全部化为灰烬。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仙霓社即告散尽。仙霓社的成员和其他传字辈的演员各奔东西，散落各处，有的甚至贫病交迫，冻饿而死在上海街头。

新中国成立后，古老的昆曲艺术枯木逢春。传字辈艺人大多流落在江、浙、沪一带，三地政府及时安置了他们。在上海的传字辈演员集中到了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戏曲研究院。在新的历史时期，传字辈又成为复兴、继承昆曲艺术的中坚力量。首先是在舞台上恢复演出传统的昆曲剧目和整理改编的剧目，如1955年，浙江国风昆苏剧团（后改建为浙江昆苏剧团）改编演出了《十五贯》（由周传瑛、朱国梁、王传淞、包传铎等主演），被誉为“一个戏救活了一个剧种”。

其后，相继成立了江苏省昆苏剧团、北方昆剧院；湖南举办了湘昆学员训练班等。至1960年，全国有昆曲专业工作者六七百人，加上业余曲社，已近千人。

续写昆曲的传奇

传字辈艺人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传字辈在传授昆曲技艺、培养昆曲艺术的接班人方面，更是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54年华东戏曲研究院开办昆剧演员训练班，从全国调集传字辈任教，1955年上海市戏曲学校成立，昆剧训练班转为该校第一届昆剧班，由朱传芳、沈传芷、张传芳、华传浩、郑传瑛、倪传铎等11位传字辈艺人担任教师。第一届昆剧班（后称昆大班）学员50余名，8年制，培养出了一批优秀昆剧人才，如官生蔡正仁、巾生岳美缇、老生计镇华、顾兆琳、闺门旦华雯漪、张洵澎、蔡瑛、贴旦梁谷音、武旦王芝泉、净角方芳、丑角刘异春、武丑张铭荣等。这批学生由传字辈艺人精心传授了250余出折子戏。

这一批演员扮相俊美，嗓子好，基本功扎实，而且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创造能力。1961年秋毕业后组团公

演，立即轰动上海，不久赴香港演出，又誉满港九。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昆大班的演员一直活跃在舞台上，演出大量的昆剧传统剧目和新编剧目，成为一支劲旅。他们之中有12人为被评为一级演员，7位荣获梅花奖，6位荣获白玉兰奖，被全国教育界公认为“成才率最高的班级”。

1959年，上海市戏曲学校又招收了第二届昆剧班（称昆小班），培养出了张静娴、陈同申、段秋霞、史洁华等一批人才。另外一些传字辈老教师在苏州和浙江也培养出了“继字辈”“世字辈”等一批昆曲精英，他们中有张继青、柳继雁、潘继正、尹继芳、朱世藕、汪世瑜、沈世华、张世铮等。

1981年末至1982年初，文化部提出“抢救、继承、改革、发展”的昆剧工作方针，强调要把抢救放在首位，传字辈周传瑛、王传淞、姚传芳、郑传瑛、方传芸、倪传铎及王正彦等向上海昆剧团的演员传授濒于失传的昆曲折子戏。

1986年1月，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成立，周巍峙任名誉主任，俞振飞任主任。4月，在苏州主办第一届昆剧演员培训班，传字辈老艺人通过艺术传授，又抢救了一批濒于失传的剧目。

1986年12月，指导委员会在上海举办第二届昆剧演员培训班，各地的学员70余人。郑传瑛、王传淞、邵传铎、周传沧等主教了20个传统折子戏。通过这些活动，上昆能演的折子戏从250余出增加到300余出。

传字辈承上启下的风气还产生了连锁反应，以上海为例，昆大班、昆小班的艺术家又接过接力棒，担负起培养年轻一代的任务。粉碎“四人帮”后，上海戏校相继办了昆三班、昆四班、昆五班，培养出了张军、黎安、沈映红、余彬、谷好好、袁国良、吴双等一批新秀。致使昆曲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江苏、浙江等地也涌现出一批新秀才俊。

20多年前，我国的昆曲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深化，以及近年来昆剧推广活动的展开，昆剧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年轻观众群，生存状态有了很大的改观。“传字辈”的几代传人正在努力续写昆曲的传奇。

（作者系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钱伟长弃高薪

姚秦川



1943年，钱伟长在获得了多伦多大学博士学位后，正式加入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实验室，与钱学森、郭永怀、林家翘一起，师从“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

当时，钱伟长主要从事弹道计算和各种不同类型导弹的空气动力学设计。二战期间，伦敦遭受德国V1、V2导弹的威胁。英国首相丘吉尔向美国求援，美军于是将任务交给了喷射推进实验室。

钱伟长等人经过研究分析，发现德国导弹是从欧洲西海岸向伦敦发射的，多数落在伦敦东区，说明这就是德国导弹的最大射程。据此，钱伟长提出，只要在伦敦市中心地面造成多次被击中的假象，以蒙蔽德国导弹仍按原射程攻击，伦敦市中心就可避免遭受破坏，英国接受了这

一建议。丘吉尔后来在回忆当中谈及此事，赞赏“美国青年真厉害”。殊不知，这一建议是来自一位中国青年。

到了1946年，钱伟长与冯·卡门合作发表《变扭率的扭转》一文。冯氏曾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为经典的弹性力学论文。然而，就在论文发表后不久，在同行眼里前途一片光明的钱伟长却突然消失在他们的视线里。原来，他履行了6年前出国时立下的誓言，放弃年薪8万美元的工作，以探亲为名悄然回国。

回到国内，面对众人的不解，钱伟长掷地有声地说：“我的脑袋不应该给他们用，我的脑袋应该回来给中国人用。”钱伟长的一番话，令所有人敬佩不已，这种大无畏的爱国之心，值得后人尊敬。

废名的自负

王剑



1931年，废名进入北京大学国文系，与钱玄同、傅斯年并称北大“三大魔”。

废名是极富艺术个性的作家。他的小说《竹林的故事》《莫须有先生传》《桥》等，“以冲淡为外衣”，以文化为内核，被誉为“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奠基之作”。

废名小说写得好，课讲得也很有特点。废名讲课的方式，是旁若无人的自问自答。兴之所至，“时而眉飞色舞，时而义愤填膺，时而凝视窗外，时而哈哈大笑。大笑时常常挨个儿扫视学生的脸，急切地希望看到同样的笑意”。

废名非常自负，常常语出惊人。有一次，他给大一学生讲鲁迅的《狂人日记》，开讲便说：“我对《狂人日记》的理解，比鲁迅先生自己都深刻。”如此直截了当，令学生愕然。

当时，北大的国文课要求学生每月写一篇作文，交由老师批改、当堂讲评、发还给学生。废名先点评汤一介的作文，说：“你的文章像下雨的

雨点，东一点西一点，乱七八糟！”随即，又表扬一位女同学的文章：“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像我的文章，不仅形似，而且神似，优美、简练、清新。”

过了几天，废名要讲写作中的炼句，直接就举自己小说《桥》中的句子：炎热的夏日，两个女孩在烈日下走了很长的路，忽然“走近柳荫，仿佛再也无法往前一步。大树不过一把伞，画影为地，日头争不入”。废名自负地说：“‘日头争不入’真是神来之笔啊！写文章就要写出这样的句子，才叫大手笔……”说罢，满面得意之色。

废名容貌奇古，“额如螳螂，眉棱奇高，声音苍哑”，说话做事常有文人的偏执。当时，他与熊十力对门。熊十力批评佛教，而废名信仰佛教，两人常常为此争吵。这一天，两人又争辩起来，起初声音很大，可忽然万籁俱静，一点声音都没有了。邻居们感到奇怪，纷纷出来查看。原来熊冯二人互相卡住对方的脖子，都已发不出声音了。

高晓声种红薯

周星



20世纪50年代末，著名作家高晓声在老家农村学会了种红薯。

在苏南地区，原本是很少种红薯这种植物的。只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苏北地区有许多船满载着红薯和白萝卜前往苏南地区进行交易。苏南的农民就用家中一些剩余的稻谷和苏北农民换些红薯和白萝卜。换回家的红薯可以给孩子们解馋，白萝卜可以烧汤喝。在丰衣足食的时候，孩子们如果多吃了红薯不愿意吃饭，还会遭到大人们“斥责”：“贱骨头一个，有饭不吃，还要吃山羊！”但终究挡不住孩子的爱好，苏南也开始种山芋了。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苏南地区红薯种植也遍地开花了。

高晓声也开始学种红薯了。他在家门口一块空地上种上了红薯秧苗。但是他运气不好，刚种下去的红薯

就遇上了大旱天气，十天半个月都不下雨，又没有什么肥料，泥土硬化结成了块，红薯的藤蔓缺水缺肥也不长了。好不容易等到下大雨缓解了旱情，结果那些红薯蔓藤一个劲儿地疯长，地下的红薯缺少营养就长得特别慢。村里的孩子扛不住饥饿，还没有等到红薯长大，就去偷偷地挖，用衣袖随便擦几下就生吃了。他们还给这种吃法起了个外号叫作“猫猪吃”，意思就是断了红薯的根。俗话说“天不打破吃饭人”，高晓声虽然知道这些孩子来偷挖红薯，但也只能做“木匠师傅弹线——张一闭眼一闭”，随他们去了。红薯藤蔓叶子长得那么茂盛，自然也不会浪费，虽然有些苦涩，但在那个时候能填饱肚子，就已经是美味佳肴了。

高晓声和同乡人就是靠着这些红薯度过了那三年最艰难的时光。

乡土昆曲在湘昆

雷克昌

明末清初，被称为“百戏之祖”的昆曲从苏州传入湘南桂阳、嘉禾一带，与当地人民生活语言、风俗、习惯相结合，并受祁剧和民间音乐的影响，形成艺术上有别于苏昆、京昆的流派——湘昆。

清同治、光绪年间，全国昆曲走向衰亡。但湘南桂阳一带，昆曲仍处鼎盛时期。然而好景不长，1927年，昆戏班在桂阳演出期间，被国民党政府以“严防奸宄”为名，封箱禁演。加之昆曲本身存在弱点，上座率急剧下降。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湘昆随着湘南残存的最后一个昆班的解散而偃旗息鼓，昆曲艺人流向祁剧、湘剧戏班。

20余年后，部分昆曲艺人在桂阳组成祁剧团，但由于剧团本身行头破旧、行当不齐，致使观众反响冷淡，剧团经营暗淡。1951年，衡阳湘剧台班应邀到桂阳演出。演出结束后，桂

阳县人民政府把台班留下来，在桂阳登记落户，与祁剧团合并成立桂阳前进湘剧团。1954年4月，嘉禾业余祁剧团派人到桂阳湘剧团请祁剧艺人教戏。桂阳祁剧演员到嘉禾后，扎根嘉禾，于同年7月20日成立嘉禾革新祁剧团。

1955年夏，嘉禾县人民政府文教科科长李沥青发现嘉禾县祁剧团内从桂阳过来的祁剧老艺人肖剑昆、肖云峰、匡升平等人会唱昆曲，遂着力组织发掘。李沥青相继整理改编上演了《三闯负荆》《武松杀嫂》等昆剧，一时享誉当地。濒临衰亡的湘昆剧种，在湘南嘉禾县这座古城获得了复兴和发展。

1957年，李沥青改编的昆剧《武松杀嫂》在湖南省会长沙演出获奖。戏剧家田汉看了演出后，称嘉禾县“发掘了湘昆这门古老剧种，真是山窝里飞出了金凤凰”。同年，戏剧大师梅

兰芳听说嘉禾整理上演了昆剧时，十分高兴，提出要把湘昆剧种发掘出来，于是当地组织了一批老艺人，深入发掘、全面抢救湘昆。

同年，湖南省文化局拨款4000元，委托嘉禾县人民政府举办湘昆训练班，由时任副县长李沥青筹备。1957年12月招收十一二岁的小学员25名，开办了“嘉禾昆曲训练班”，于12月16日在城东义公祠正式开学，培养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湘昆艺术人才。1959年，以嘉禾昆曲训练班人员为基础，组建了“郴州地区湘昆剧团”，1964年改为“湖南省昆剧团”，后改为“湖南昆剧团”，再后来又恢复称“湖南省昆剧团”。该团成为文化部重点保护的全国五大昆剧院团之一。

湘昆剧团的足迹遍及国内大中城市。1961年该团首次进京演出，广受好评。1986年第二次进京，与全国五

大昆剧院团联袂献艺。《人民日报》刊登简记《幽兰丛中春无限》说，雷子文演《醉打山门》，单腿“金鸡独立”十几分钟，模拟十八罗汉众生相，尤为当前舞台所罕见；张光富唱的《见娘》工整规矩，湘音突兀，独现乡土昆曲之风韵。1987年底，该团再次进京参加全国昆剧抢救继承剧目汇报演出，王蒙、周巍峙和戏剧界专家们同声赞扬说：“湘昆风格独树一帜”“昆剧少了湘昆不完整”。1988年1月，文化部推荐湘昆剧团进中南海演出《一天太守》，萧克、宋任穷、赵朴初、韩念龙、朱穆之、张平化等观看了演出，并合影留念。

1994年6月，在京举行的首届全国昆剧青年演员交流演出中，湖南昆剧团参演的《游园》《挡马》《剪发》《痴梦》《出猎》《见娘》等折子戏，令首都观众为之倾倒。1997年11月27日，五大昆班赴台湾省参加“昆剧之美”戏剧演出活动，湘昆首次亮相台湾省，反响极为火爆。

湘昆能走出嘉禾、登上首都大舞台，是用智慧、汗水哺育出的一朵艺术奇葩。2001年5月18日，中国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湘昆作为中国昆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有荣焉！



季羨林无声的鼓励

张雨

2001年的一天，北京大学教授张保胜到北大朗润园看望恩师季羨林。季老知道张保胜在梵文方面下过一番工夫，问他有没有兴趣研究梵文？张保胜表示愿意。

梵文是一种语法最为复杂的古代语言，也是当代中国读者了解很少的一种语言。当年季羨林在德国留学时，只有他一个人学梵文，教授只给他一个人讲课。

季羨林从书柜里拿出一本《永乐大钟铭文真迹》送给张保胜，并对张保胜说：“倘若能成功解读，揭开这座有近600年历史的佛钟奥秘，不仅是学术上的一大成果，对弘扬中华文化也具有重要意义。”

接受任务后，张保胜手不释卷、废寝忘食、孜孜以求地考证、解读、研究，从不敢懈怠。季羨林多次打电话询问研究进展，在予以鼓励的同时，还把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毫无保留地传给张保胜，这对

张保胜的研究起到了莫大的帮助。

2001年11月19日，张保胜在大钟寺现场讲解梵字铭文，吸引了不少媒体和观众。那天，天气阴冷，北风呼啸，但年过九旬的季羨林如约来到现场，一坐就是两个多小时，直至张保胜讲解结束才离去。

没过多久，季羨林就被送往重症病房。有的弟子埋怨季老不该在寒风里挨冻两个多小时。季羨林却说：“张保胜讲的有些东西，我还不了解，很有必要听听。”

其实，季羨林完全可以事后与张保胜面对面地交流，他坚持在寒风中坐了两个多小时，是以自己无声的举动，不动声色地来表达对张保胜的学术研究的鼓励和支持，也彰显了季老对待学问和学生的挚诚之心。

2006年，张保胜的专著《永乐大钟梵字铭文考》一书出版，季羨林为此作序。